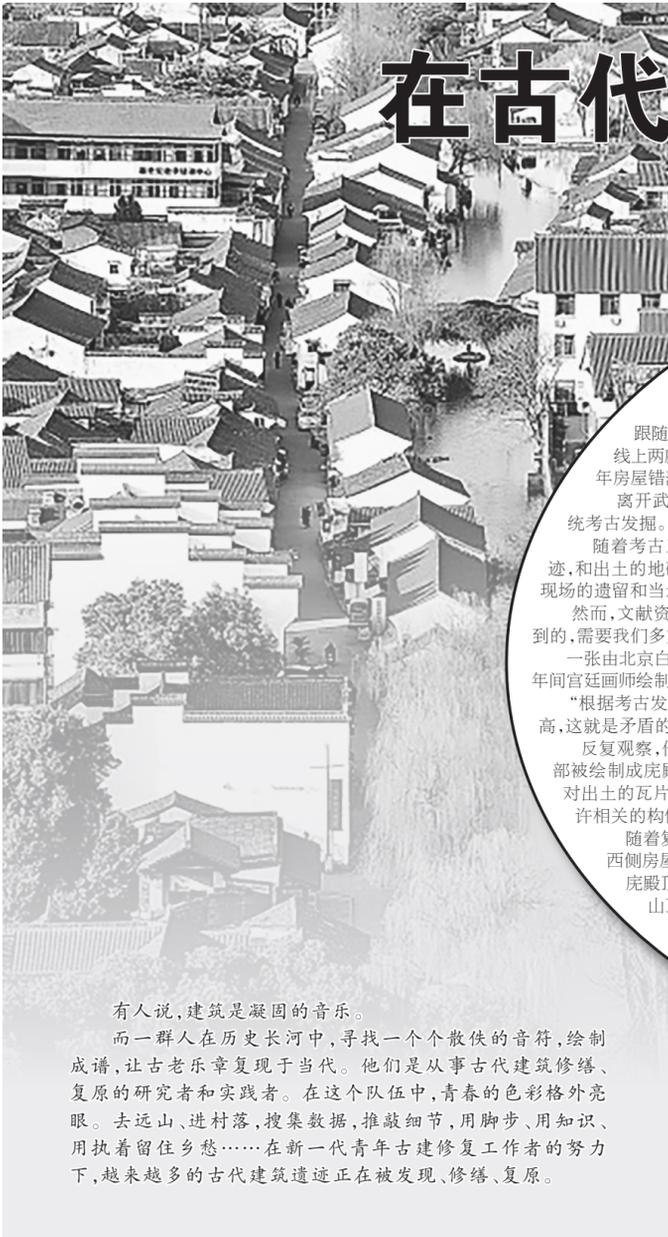


在古代建筑中寻找历史回响

——走近修复古建筑青年人



反复推敲 找回原貌

2022年11月18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20年9月以来对武当山五龙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

早在2年多前,已有古建筑修复团队抵达这里。2020年6月,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牧跟随导师王炎松,来到湖北武当山五龙宫调研。自明代大修武当山以来,五龙宫历经毁建。曾经的建筑群只剩下主轴线上的两座近年重建的宫殿,其他地区断壁颓垣,几近荒芜。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规划修编与复原的研究者,陈牧不禁好奇:当年房屋错落、香客盈门的五龙宫究竟原貌如何?

离开武当山,陈牧一直忘不了五龙宫。他没想到的是,其后三个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武当山五龙宫进行系统考古发掘。而他所在的团队,也接到了对其建筑遗迹进行数字化复原研究的课题。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五龙宫遗址逐渐清晰。2021年,陈牧和团队与考古人员一起,几度再临五龙宫,对现场台基、宫墙等遗迹,和出土的地砖、瓦件等建筑构件进行测量记录。同时,他们还对武当山地区同时期的建筑进行了调研,以备复原研究参考。“除了现场的遗留和当地同时期的建筑,做复原研究还有一项重要参考,就是相关文献,例如山志、舆图等。”陈牧介绍。

然而,文献资料也不可尽信。在敲定考古发掘区建筑群的结构细节时,屋顶形制的溯源让他犯难。“屋顶在遗址中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需要我们多方考证。”陈牧说。

一张由北京白云观收藏的“武当祥瑞图”给陈牧和团队出了难题。这张平面地图记录了武当山建筑群的基本位置和样式信息,为明永乐年间宫廷画师绘制,有较高可信度。该图显示,五龙宫考古发掘区建筑群的屋顶为庑殿顶,但位于主轴线上的拜殿屋顶却是歇山顶。

“根据考古发现,考古发掘区的建筑主要是配殿和用于生活起居的房屋,等级肯定低于拜殿。但是一般而言,庑殿顶的等级比歇山顶高,这就是矛盾的地方。”陈牧说。对此,陈牧和团队成员大胆猜测:图示信息有误。

反复观察,他们希望能在图中找到蛛丝马迹。很快,第一个能佐证他们猜想的证据浮出水面:图中其他建筑群的附属建筑屋顶全部被绘制成庑殿顶,这显然是不符合等级规定的。陈牧和团队沿着猜想往前进了一步。接着,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出土文物。在对出土的瓦片、琉璃等建筑构件进行研究时,他们没有找到属于庑殿顶结构的构件,没有能证明庑殿顶存在的直接证据。但,“也许相关的构件已经不复存在或未被发现?”陈牧觉得,这张地图毕竟是官方绘制,若要完全推翻还需要“实锤”。

随着复原研究的进行,考古发掘区建筑的数字化模型逐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陈牧和团队又发现:考古发掘区南道院西侧房屋的山墙和崇台距离狭窄,如果把屋顶绘制成庑殿顶,那屋檐和崇台就会碰撞。“两面墙壁太近了,没有空间容纳庑殿顶的出檐。据此,我们推断图中的庑殿顶有误。”陈牧和团队最终推测五龙宫考古发掘区建筑的屋顶形制为悬山顶,而不是武当祥瑞图所示的庑殿顶。

像这样的反复推敲,在陈牧十余年的从业生涯里进行过无数次。2018年,工作了数年的陈牧回到武汉大学教授王炎松门下继续从事古建筑研究。“工作后我一直怀念跟着王老师调研古建筑的日子。有时,我们会因为发现了一处古代建筑兴奋、狂喜。”回到校园的陈牧希望发掘更多祖先营造人居环境的智慧,让古代建筑之美被更多人看到。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而一群人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个个散佚的音符,绘制成谱,让古老乐章复现于当代。他们是从事古代建筑修缮、复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这个队伍中,青春的色彩格外亮眼。去远山、进村落,搜集数据,推敲细节,用脚步、用知识、用执着留住乡愁……在新一代青年古建修复工作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古代建筑遗迹正在被发现、修缮、复原。

精巧匠心 溯本追源

雨后,天门岭上云雾氤氲。山下,黄墙青瓦。群山之中,一片“世外桃源”。若不是几辆不时驶过的汽车,踏入何源村的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步入了一座明代小镇。

80后返乡青年南官琦,一袭汉服、气质儒雅,好似山中隐士。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手艺远近闻名。在儿时记忆里“叮叮当当”的声响中,南官琦很早便熟悉了赣派古建筑的木质结构,伴着家乡的山溪、翠竹、奇石、古建,他的志趣逐渐向古建筑保护靠拢。

2017年,建筑专业毕业的他回到故乡何源村,通过修复当地古建民居建造了自己梦想中的古典园林——南园小隐,并结合自己专业所学,投身当地古建保护工作。

抚州金溪县下辖的几个自然村落,原本有千余座明代建筑。早年间,村民们对古建的价值知之甚少,不少外地商人用很低的价格从村民手中买下民居,拆散后运到大城市,作为建筑装饰之用。说到这里,南官琦不免感到心痛:“要是大家早点知道这些古建筑的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好多东西白白流失了!”后来,当地政府进行古建筑文物认证,制止私人买卖,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此外,村民私自修缮寓所,也有可能“好心办坏事”。“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村民纷纷重修房屋。赣派建筑和徽派建筑外形有些相似,不少村民不懂其中分别,就按照徽派民居的样子重修古宅,结果弄得‘四不像’。”南官琦难掩心痛。

为此,向村民普及古建知识,成了南官琦的重要任务。年复一年,他手不释卷、孜孜以求,研究赣派古建筑特色,挖掘出了不少古建背后的历史故事。他把自己的所知讲给乡亲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的认识。

人人参与,古建新生。从“拯救老屋行动”到“古村活化利用”,在许多同南官琦一样的青年人推动下,何源村成了流光溢彩的网红旅游地,一个个“沉睡”数百年的古建筑,在看得见的变化里渐次“苏醒”。

乡村博物馆蓬勃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近年来,“文博热”席卷中华大地,在广袤的乡间,一座座乡村博物馆蓬勃生长,成为亮眼的人文景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乡村历史文化的载体,乡村博物馆在传承乡村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旅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乡村振兴热潮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扎根乡土 留存文化记忆

走进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东红村,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映入眼帘。在这个面积2.2平方公里的村落中,分布着8间乡村博物馆。春米机、捕鱼船、纺车、煤油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展示着当地的农耕文化和传统民俗。

东红村历史悠久,村庄原始面貌保存较好,有百年以上古民居600多间。在2018年开展的“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中,东红村修缮恢复560余座古民居,维持其原有格局,以利用促保护,打造了“民俗嫁妆”“竹编家具”“龙舟文化”等8间各具特色的乡村博物馆。馆内的展品大多是“三清三拆三整治”时村民们清理出的农具、旧家具、日用品等,这些老物件在乡村博物馆中“变废为宝”,作为村

史民俗的见证,让人们记住乡愁。

在风景秀丽的浙江杭州超山风景区东园东侧,3座明清时期的徽派老房子静静矗立,这就是江楠糕版艺术馆,今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名单中。这是一家专业收藏糕点制作模具的博物馆,藏品多达6000余件,除了常见的木质糕版,还有瓷质糕版、南唐年间的石质糕版等。馆内展览讲述了糕版与风土习俗的密切关系、糕版的发展变化以及不同地区的糕版文化。

博物馆二楼设有两间体验教室,观众在这里可以体验制作糕团。每逢中秋、重阳等重要的传统节日,馆内会举办用传统糕版制作糕点的活动。此外,江楠糕版艺术馆还在塘栖第一小学成立分馆,定制糕版文化系列课程,并培养小小讲解员,让孩子们了解江南水乡的民俗,感受糕版文化的魅力。

“乡村博物馆作为乡村中的公共文化设施,连接乡村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共同记忆,形成乡村的文化共同体。”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侯晓蕾说。

文旅融合 带动乡村经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建在城市里的考古类、艺术类博物馆不同,乡

村博物馆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及他们的需求,有助于增强农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让乡村的氛围更加和谐。”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认为,乡村博物馆具有复合型的功能定位,既是凝聚乡情民意的博物馆,又是带动产业发展的平台。博物馆的建设及相关活动的开展,能够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位于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良山镇下关村的农耕文化展示馆,自2015年建成开馆后就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观。当地趁热打铁,成立了文化旅游公司,在参观展览的基础上,开发更多体验性项目,增强乡村旅游的趣味性。在农耕文化体验区,游客可以进行种菜、采摘、烧柴火等农事活动,感受土地翻耕、育秧、插秧、收割、入仓的全过程,体验打麻糍、切糖片、做米圆、酿米酒、做豆腐等农家乐项目。文旅融合带来了人气和商机,小小的村子一年能吸引游客30余万人次。2020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5000余元,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瓯窑小镇,瓯窑文化博物馆是了解瓯窑历史、领略制瓷技艺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展示了

500多件古今瓯窑瓷器,并开设非遗体验区,编制了丰富多彩的课程,开发了备受青少年欢迎的研学游线路。在近距离感受瓯窑文化的同时,游客还可以体验缜绣、缜塑、糖画、永嘉麦饼等当地非遗项目。体验式消费的火爆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并为年轻人提供了留在当地发展的机会。不少年轻人来到博物馆,学习瓯窑烧制技艺。

多元参与 突出地方特色

今年4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发布《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将建成乡村博物馆1000家。这是全国范围内首份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从基本定义、建设要求、服务要求、运营要求、认定程序等方面对乡村博物馆进行了规范。指南中这样定义乡村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收藏和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化及乡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

在业界专家看来,指南回应了乡村

博物馆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主题不清、同质化严重、缺乏与所在地关联,等等。指南强调乡村博物馆要有固定的基本陈列,展览主题明确,内容多样,体现鲜明的在地性,突出“一村一馆一品”的地方特色。

“乡村博物馆的建设要强化乡村特性与差异性,构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以点带面的网络化格局,打通博物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侯晓蕾说。

博物馆建起来了还要活下去,运营管理所需的人力财力不足是摆在很多乡村博物馆面前的现实困难。

安来顺认为,乡村博物馆要想实现长久、良性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应推动博物馆与当地其他文化资源整合,形成乡村文化的聚集地。

侯晓蕾指出,乡村居民是乡村博物馆建设的真正主力军和受益人,建设初期虽然依靠政府推动,但真正盘活乡村生态、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要靠村民自身的能动性。“应当建立乡村博物馆运营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博物馆自筹、专项资金运作等。同时给村民带来工作岗位,推动民生发展。”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乡村博物馆发展前景广阔。“乡村博物馆要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要和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实现共赢发展,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找到公约数、画出同心圆,共同绘制乡村美好生活画卷。”安来顺说。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文/黄敬惟 邹雅婷)

数字画笔 重绘记忆

近年来,全世界时有发生历史古建筑于灾害的事件,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古建筑保护不易,对于以纯木、砖木、土木结构为主的古建筑而言更是如此。面对文物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如何用更先进的手段、更智慧的途径加以呵护?

用数字“画笔”留下古建神采,是一些研究者的尝试。“对于现存的古建筑,数字档案可以记录其建造细节和工艺工法,为研究修缮提供指引,对抗时间的侵蚀或意外损坏;对于已消失的古建筑,数字复原往往能够再现一段历史,复现其背后珍贵的文化记忆。”从事古建筑保护规划研究的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白雪悦说。

一年多前,白雪悦在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袁琳的带领下,参与了大明宫研究院委托相关公司开展的“大明宫数字化复原”项目,基于唐大明宫遗址考古研究成果,运用数字化建模手段,对大明宫进行虚拟复原。即便有过不少古建规划设计及仿古建筑设计经验,复原大明宫建筑对白雪悦来说仍是很大的挑战。就麟德殿而言,整个官殿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建造它用了192根柱子,是故宫太和殿的3倍。但如今麟德殿已不复存在,甚至整个盛唐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建筑都屈指可数,研究者们无法直观地走近它们,唯有如侦探一般,拨开岁月尘埃,寻找线索,方能稍微窥见其原貌。

白雪悦透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尝试感知麟德殿所呈现的盛唐气息。每发现可参考的资料,白雪悦就把它们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到最后竟攒了169份文件。

感知只是第一步。绘制复原模型图不是简单地画平面图,而是在科研基础上,完全用三维的办法来“表达”建筑。由于唐代屋檐制式已不可考,白雪悦在导师的帮助下,通过宋代《营造法式》记载的古建技法推算麟德殿“举折”,让一根根椽子折出一条缓和的弧线,再论证这条弧线是否符合唐代建筑舒展、大气的风格。实际绘制中,白雪悦有时会发现依靠前人记载绘出的模型并不合理。她得想象自己“在现场”,走进亲手绘制的大殿之中,观察每一处细节,运用科研人自身的逻辑、经验和审美去考量。白雪悦说:“复原建筑本身不是目的,探寻古建筑承载的文化,复现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才是。”

今年11月,“云上宫阙”——大明宫数字化复原成果展亮相,白雪悦绘制的复原模型图,经过相关团队的3D模型搭建和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再现了大明宫的雄伟风貌。

“我游览过唐大明宫遗址,觉得有些遗憾,若大明宫还在,得多好啊。今天看到数字复原的大明宫,有种愿望成真的欢喜,这是历史的另一种演绎!”一位参观者感慨道。

(摘自《光明日报》文/殷泽昊 李丹阳 范天培)

新时代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故事的主流,纪录片《黄河安澜》成功发掘出“黄河宁,天下平”的当代故事,定格新时代沿黄九省区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恢弘场景

纪实影像还原黄河治理史

纪录片《黄河安澜》,用《国脉千秋》《力挽危澜》《量水而行》《重现盎然》《发展新路》《幸福长河》6集篇幅,讲述黄河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历史关联,展现新时代黄河治理“黄河安澜”这一梦想付出的不懈努力,为深入挖掘黄河价值、讲好黄河故事、描绘新时代黄河高质量发展图景提供重要启迪。

《黄河安澜》以文明史的大视野重构黄河的宏大叙事。黄河浩荡,九曲连环,哺育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纪录片采取多元化视角,系统追溯了黄河与中华民族起源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从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的动物烧骨到甘肃大地湾遗址中的碳化谷物,再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大量使用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的迷雾,了解探究文明的起源。

在对黄河文化史的讲述中,神话与现实的交相辉映,让我们看到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与黄河数千年的相伴中,滋养出丰富多元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情怀;在与自然灾害的搏斗中,凝聚形成特有的精神气质,赓续绵延、生生不息。

用纪实影像生动还原黄河的治理史。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将“黄河人、黄河事”讲清楚、讲精彩,创作团队秉持科学视角和严谨思维,在资料收集和文案撰写方面下足功夫。3年间,摄制组走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9个省区40余座城市,前后5次深入三江源,探访东营黄河入海口,采访了众多水文工作者、水利科学家和普通民众,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作品通过史料活化和专家访谈的方式,直面自古以来黄河治理的大难题,讲述黄河曾经的决口、泛滥、改道,以及经过不懈治理,实现黄河安澜的历史过程。

充分发挥纪录片的纪实特征,聚焦黄河流域的基层社区和流域治理一线战场。纪录片通过山东东营黄河口镇一位耄耋老人的视角,讲述黄河新流路沿线百姓带来的实际困难;讲述了山西柳林县农民从眼睁睁看着黄河水却需要靠天吃饭,到通过新的灌溉技术脱贫致富的转变。第二集《力挽危澜》,透过水利人王化云的个人故事,折射出三门峡水利建设和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宏大叙事。

新时代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故事的主流,《黄河安澜》成功发掘出“黄河宁,天下平”的当代故事,定格新时代沿黄九省区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恢弘场景。黄河流域的治理积极引入先进理念和前沿技术,将当代黄河打造成科技含量高的一条河流。黄河治理也催生了一批新型行业,提升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水平。影片以高度凝练的视听语言巡礼了一批最新的治理成果,用镜头记录了黄河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变化。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一系列保护措施出台,牧民们放下牧鞭、端起了“生态碗”,草原重现盎然生机;河海交汇处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面积逐年回升,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呈现出林丰草茂的壮观景象……一个个真实案例,一处处生动细节,印证黄河治理和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黄河安澜》开拓了纪录片创作视野,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拓展中国故事的深度广度做出积极探索。

(摘自《人民日报》文/梁君健)



纪录片《黄河安澜》剧照 北京广播电视台供图